

亚当·斯密的教育哲学思想及其启示

王君柏

(江南大学 法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摘要] 文章通过对亚当·斯密高等教育思想的梳理,反思我国当前高等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即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务实理性的国民,要以问题为中心进行通识教育,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分配应该多元化、市场化,国家只应该对基本教育提供保障,对于教师的激励,应该从内心的敬业精神方面着手,培育教师共同体意识,减少外在的评价机制。

[关键词] 亚当·斯密;大学教育;国家与市场;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7)04-0033-04

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曾经说过,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很多关键性问题上还需要重新回到亚当·斯密、边沁等人那里去,意思大概就是说,那时候的学者没有采取太多过于抽象的方法,大都是以真实生活中的人为对象,其结论也就更贴近现实和真实。也正因为如此,那个时期的学者,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没有严格的畛域之分,亚当·斯密既被视为“经济学之父”,又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文学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与贡献。他在《国富论》中,对高等教育多有论述,在我国对教育存在各种争论的背景下,重新回到亚当·斯密,确实也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一、高等教育之目的:

培养务实理性的国民

务实而不局限于具体的操作。亚当·斯密首先认为,高等教育扮演了从幼年到实际工作之间的过渡角色,即“在人的幼年时期及认真地着手事务,即在其余生中经营事务的那个时期之间,介有一个很长的期间,这期间的有利的消费,在当时似乎没有比进大学还好的办法。”^{[1]331}既然是实际经营事业的准备阶段,就需要务实。但很显然,这种务实的准备阶段,并非纯粹的职业训练,而是人的全面心智的开发,不仅如此,亚当·斯密还反对那种纯粹局限于某一特殊具体工作的倾向,认为那是对心

智的束缚,是一种精神上的残疾,而精神上的残疾比身体上的残疾更为恶劣。这大致是与中国的“君子不器”相类似的,即培养的是既务实,又不是局限于具体操作的理性国民。

作为一个实际的案例,亚当·斯密考察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差别,认为希腊国民远不如罗马国民优秀,最充分的理由就是,罗马人在“党派间的争执,不发脾气,不走极端,这是自由民族社会道德上最重要的事情”,而希腊人则“动不动就流为横暴,表演流血惨剧”^{[1]333}。而这一差异的原因,亚当·斯密把它归结为教育的后果,具体地说,就是希腊的音乐教育并未造就良好的国民,虽然受尊重的单一学者不少,但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在道德上远逊于罗马,而罗马的体操教育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具体的原因我们姑且不论,但教育对国民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尤其是高等教育,人们如果对它失去信任,就会转而求助其它,比如出国留学,斯密就认为他所在时代,大量青年学子到海外流浪,就是因为当时英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失却人心^①。

反观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虽然我们的高等教育法明确了教育的目的,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实际上离全面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通识教育要么就是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课程,要么本身就不是通识,斯密所讲的“各公

[收稿日期] 2017-03-10

[作者简介] 王君柏(1972-),男,湖南石门人,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共学校各大学所教授的大部分东西,对于学生后来经营的事务,却并不是最适当的准备”的情况,在我们当前还是很普遍,直接的结果,就是大量有条件的年轻人走出国门,到国外上学,留学越来越低龄化,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并且,往往大学校长、教授们的子女直接出国上大学者,更为普遍,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的高等教育从业者,也对自己提供的教育都失去了信心呢?间接的结果,就是国内很多在校大学生彷徨无所事事,最后通过熬时间,而得了一个毕业证,算是接受了大学教育。当大学教育已经沦落为一种资历的获得的时候,是没有完成它真正的使命的。另外一个倾向,就是过于专业化、职业化,大学生从报考学校开始,就直接与就业挂钩,大学学习期间,一切以就业为中心,急功近利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实际上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斯密所说的,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没有机会发挥他的智力,最终变为愚钝无知的人。虽然这样未必发展为愚钝无知的人,但眼界不开阔,缺乏创新精神几乎是肯定的。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亚当·斯密的路子是:实用而不拘泥于单一的技艺。这就要求教育不能空谈理论,而是通过具体事物来认识更为普遍知识。对此,后来的涂尔干专门进行了研究,在其《教育思想的演进》中,认为教育在于激发思考能力,而不是将教育对象固定在特定的职业上,而这种思考能力的培养,不能凭空进行演练,必须指向具体的思考对象,具体来说,分为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对于人的世界,在于对当前和历史的人类的认识,研究当下社会的社会科学与研究过去社会的历史科学,以及辅助历史的文学,都是为了对人的世界的认识,都是至关重要的具体思考对象。而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就是科学,以及以语言为工具的逻辑训练。涂尔干的思路,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通识教育,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确实能够在对待自然和人的问题上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大概也就吻合了司马迁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理想境界了吧,我们应该心向往之。

二、教育经费的筹措与分配:

市场与国家的作用

作为强调“看不见的手”的斯密,在教育经费问

题上,也显示出比较多依靠市场的思路,但同时,也认为国家应该适当发挥其调节作用。

大部分教育应该由公民个人或监护人来负责。正如上所述,斯密认为罗马的教育是成功的,而罗马的教育,就是由个人的父母或保护者来办理的,国家没有给予任何监督和指导,“在罗马,甚至在那法律、习俗为我们熟知的希腊共和国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国家供给薪俸,不是由国家任命”^{[1]334}。并通过对哲学、修辞学教育的考察,说明市场是如何决定了这种高雅教育的规模与形式的。按照斯密的意思,某项技能或知识若有需求,自然就有人愿意去学,也就自然产生了提供这样教育的机构。毫无疑问,需求导向的教育,应该是教育的主流,只是,我们不必一定将这种需要理解为狭义上的纯技术需要^②。

反过来说,斯密认为教育经费越是来自政府,越是充足,教育的效果越差。斯密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考察,认为民间自办的教育效率最高,其次是公共教育,效率最差的就是大学教育了。“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就英国说,公共学校固不免腐败,但和大学相比,却好多了。”^{[1]324}究其原因,斯密认为关键在于国家或组织提供固定教育经费,形成了垄断,将这种教育的输出作为公民入职的一个条件、一种资格,并不是这种教育真能为入职提供什么必不可少的素质,这实际上就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业者的薪酬来源固定化、常规化,与他们的工作表现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了,工作付出的程度就大打折扣。

当然,斯密也认识到,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士没有多少选择的自由的,这样政府就需要出面进行适当干预。最为典型的就是社会分工,导致很多人将自己的行为局限在极狭窄的单纯操作上,“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1]339}为了防止这些人完全堕落或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高端的专业教育可能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时间

① 根据教育史家的研究,斯密所处的时代,确实是英国高等教育的衰落时期,可参见贺国庆等《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无疑是对需求导向教育的狭义理解,并不如斯密对需求的理解那样宽泛。

和金钱的,但诵读、书写和算术这些基本教育,应该是所有人需要习得的,国家应该以极少的费用,就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种最基本的教育。另外,国家可以通过设置一些特定的奖惩制度,影响这些基本的教育。

反思我的高等教育,斯密的思想也有其可借鉴之处。教育经费过于依赖国家,资源过于集中于上,这样终归是改变不了教育的计划性质,市场发挥的作用相对比较小。虽然计划也有其优越性,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显然的,其直接表现,就是各教育机构都将主要精力放在“跑部钱进”上,在实际组织教学与研究上,也就侧重应付各种来自上面的评估,基于指标化的教育思路就一定占优势。而众所周知,我们今天的指标化的管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指标成为终极目标的时候,也就与“育人为本”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所以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如何做到真正有效率,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导向。有导向是好的,就怕因此而千篇一律,而人的塑造,恰恰是不能千篇一律的。更让人担心的是,一律性的导向,还可能将目标与手段颠倒,大家将具体指标性的环节当做最终目的,就更等而下之了。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中,或多或少面临的问题,影响所及,不仅仅是教师,连学生也生活在各种指标追逐之中,以致有人指出,我们的高等教育是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非空穴来风。

三、教师的激励机制问题

从教育系统内部来看,如何激励教育工作者积极发挥教书育人的作用,在斯密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用他的话说,“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1]321},其对于职业的懈怠或敷衍,可想而知。作为经济学家,斯密对激励机制的讨论,是与他的自由市场理论相一致的,即排斥激励资源的垄断,鼓励自由竞争。

首先,斯密认定,只有竞争和比赛,才能激起最大的努力。也就是说,无论哪种职业,只有将其收入与其职业表现直接挂钩,才能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反之,一切割裂二者联系的因素,都会导致疏于职守。而斯密认为,恰好存在很多因素,割裂二者

之间的联系,比如教师的收入是恒定的,与学生的反馈无关,或者学生并没有选择教师的充分自由等。

其次,作为大学教师,努力的方向就是赢得学生。斯密认为,作为教师,必须赢得学生的敬爱、感谢以及好评,而要赢得这种好评,只有自己做得配受这些好感而无愧,只有自己尽到能力和勤勉履行任务。在此基础上,赢得学生的谢礼或学费^①,这纯粹成了一个自由市场,教师之间的竞争自然形成。当然,也要防止教师采取取巧的办法达到目的,比如一味采用他人成说,贩卖国外的东西,或者形式上采取讨论的方式,自己仅仅偶尔插话,这样自己只要有有限的知识和勤勉就够了。

最后,竞争之外的监督,对激发工作表现没有多大的作用。斯密列举了这样几个方面:教师之间,往往以允许自己疏忽义务为条件,宽宥同辈疏忽其义务,不指望他们自己有监督的作用;外在权力的监督,则往往又容易出现瞎指挥,基于其对业务的无知和反复无常,监督的性质往往是任意的、专断的,这一方面降低了教师的品格,使教师成为最卑贱、最可轻侮的人,降低了教师作为一个职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导致教师曲意奉承,屈从权力,而不是从自己的职业勤勉上下功夫,激励作用偏离了教育的目标。

根据以上三点,我们也可以就当前高等教育略作反思:

第一,对高校教师这一职业,是否适合引进激烈的竞争机制?一般认为,高校教师的工作属于复杂的脑力劳动,而复杂的劳动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不必直接为物质生活条件而担忧,这样才能有自由的创新。这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斯密的假定也是不可忽视的,即任何一个职业,需要有与职业表现相挂钩的激励,尤其是针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激励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不能以少数极具奉献精神 and 进取精神的人为基础,毕竟,任何一个行业,哪怕没有外在的激励,仍然会有少数人表现卓越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激励,就进入大锅饭状态,实际上现在很多事业单位都面临这个问题,即一旦进入体制,就基本可以高枕无忧,甚至可以说,越是人们不满意的部门,越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激励与工作之间脱节。

但目前的高等教育界,确实存在某些垄断的现

^① 斯密所处的时代,教授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听课费,有市场的老师,自然收入高,老师也并不忌讳直接收取学生的学费,甚至有老师当堂用天平称学生交来的金币,以防短少。在此意义上,对教师的职业激励,已经与教师的职业表现直接挂钩了。

象,比如资源过于集中,以致只要进入某些高等教育机构,就意味着具有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发展前景,马太效应非常明显。各种学术资源存在一定的垄断性,导致想办法进入某些特定的圈子,成为最主要的事情。只有尽可能打破这些人为的垄断,才能激励人们从自己的业绩上去想办法。

第二,如何理解大学教师的职业目标?按照斯密的理解,大学的目的就是育人,大学教师的职业目标就是赢得学生的认可,当然,正如前所述,他是反对用取巧的办法赢得学生的认可的。我们现在的大学目标,虽然也强调育人,但对育人的评价,存在很多难题,无法指标化,虽然最近的学科评估,有指标化的体系出来,但还是受到很多的质疑。于是对大学的衡量,基本集中到一些客观指标上去,而尤其侧重科学研究的能力,对科学研究能力的评价,又侧重在研究经费、专利的多少、著作论文的多少等方面,于是整个队教师的激励,也多从这些方面展开。

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需要硬性规定?理论上讲,教学与科研,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良好的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对学生的最好教育,反过来,真正的大学教育,一定是带有研究性的引领学生共同探索未知世界。但现实是,两者之间的冲突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本科阶段的教育,越来越成为业界诟病的焦点,大学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已经需要有明文的规定来进行敦促。作为量大面广的本科生教育,确实是我们高等教育的主要一环,也是年轻人走向社会之前,最重要的一段专门学习时间,如何促成他们的健康成长,以健全的心智走向社会,无疑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但目前的考评体系,确实忽略了这个重要事情,至少是不同程度的忽略了。

当然,直接给学生上课,只是培养人的一种方式,传道、授业、解惑是一个全方位的复杂综合过程,我们之所以一直强调育人的重要性,而实践中往往又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关键在于育人过程是一个良心工程,客观指标的衡量往往不得要领。若要有所凭据,恐怕只有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培育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一方面考虑学生的综合评价,但都不适宜采取指标化的方式,而是应该形成教师共同体,每一个基层教学单位,一旦形成自己的共同体,在评价问题是会尽量公允的,毕竟都是熟悉的人,都是在桌面上讨论问题,违背是非标准是很难的,倒是过多运用匿名评价的方式,反而可能成为掩饰是非标准的一个工具,成为逃避责任

的一个工具。

第三,减少外在监督机制。鉴于上述讨论,在评价机制上,应该减少外在监督机制,加强内部共同体建设。在宏观层面上,教育系统要有适合自身特点的评价系统,每个高校也要有足够的自主权,这一方面要减少教育的行政干预,一方面要减少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干预,而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要使教育经费的来源多元化。在微观层面上,要减少对高校教师的指标化考核,因为当前几乎纯粹靠外在评价机制来激励或控制教师,事实上已经出现了斯密所讲的那些弊端,对上曲意阿谀者有之,对下投其所好、无原则者有之,将责任重大的教育工具化,或者娱乐化,当这些方式可以轻易获取资源的时候,自然不必老老实实教书育人,使教育有脱离目标的趋势。

四、小结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经规模庞大、成就斐然,这是与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分不开的。但是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因为时间太短,加上整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是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在经验的积累上,当然以自己国家的传统和实际经验为主,找到自己的高教之路,但他山之石,尤其是其它国家快速发展时期的经验,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亚当·斯密的高等教育思想,是英国快速发展转型时期的经验,很多方面与我国当前有切合之处。培养目标上,务实与理性这一综合目标,显然对当前过于功利的倾向有一定的矫正作用,对未来一代人的精神与理想,高校应该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工具理性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尤其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放弃工具理性意味着被动挨打,但全然忽略价值理性,必然导致理想信念的缺失,最终落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窠臼了,这也正是当前高校理想信念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教育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教师激励机制的市场化与共同体内部相结合,都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参 考 文 献]

- [1]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 [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责任编辑:闫卫平)

(下转第 41 页)